



# 莊子學史

---

【第二冊】

方勇◎著

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第四编 宋元庄子学

第一章 宋元庄子学概说·····	(3)
第一节 宋元庄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3)
第二节 宋元庄子学的发展过程·····	(9)
第二章 北宋中期的庄子学·····	(25)
第一节 王安石的《庄周论》·····	(25)
第二节 苏轼的《庄子祠堂记》·····	(29)
第三节 吕惠卿的《庄子义》·····	(37)
第四节 陈详道的《庄子注》·····	(43)
第五节 林自的《庄子注》·····	(49)
第六节 贾善翔的《南华真经直音》·····	(57)
第三章 王雱的《南华真经新传》·····	(61)
第一节 略仿郭注体例而异其旨趣·····	(63)
第二节 对王安石庄子学思想的宗承与超越·····	(68)
第三节 对各篇作意与逻辑结构的用心探究·····	(73)

第四节	对庄子制名寓意的多所发微 .....	(79)
第四章	陈景元的《庄子》研究 .....	(83)
第一节	陈景元五种庄子学著作概说 .....	(84)
第二节	陈景元庄子学思想的道教倾向 .....	(91)
第三节	陈景元在《庄子》音义、考异方面多有贡献 .....	(100)
第五章	林希逸的《庄子口义》 .....	(106)
第一节	对旧注旧说的承因与批评 .....	(107)
第二节	对庄子学说与儒学、佛理的大力整合 .....	(116)
第三节	对《庄子》文字、笔法、意境的多所评析 .....	(130)
第四节	《庄子口义》在中国、日本历史上的影响 .....	(138)
第六章	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 .....	(141)
第一节	保存两宋治庄遗说十馀家 .....	(141)
第二节	“管见”大抵以道家说解释《庄子》 .....	(145)
第三节	“管见”对经文、传注的考校与审定 .....	(151)
第七章	罗勉道的《南华真经循本》 .....	(158)
第一节	对《庄子》本旨的用心寻绎 .....	(158)
第二节	执“化”字以寻绎《逍遥游》的义旨 .....	(167)
第三节	创“二十六篇”说以修正苏轼的真伪观 .....	(173)
第八章	刘辰翁的《庄子南华真经点校》 .....	(177)
第一节	对林希逸《庄子口义》的多所批驳 .....	(177)
第二节	开创《庄子》评点之先河 .....	(184)

第九章 北宋后期至元代其他人的庄子学 .....	(190)
第一节 李士表的《庄子九论》 .....	(190)
第二节 程俱的《庄子论》 .....	(194)
第三节 赵以夫的《庄子内篇注》 .....	(198)
第四节 王应麟的《庄子逸篇》 .....	(203)
第五节 黄震的《读庄子》 .....	(208)
第六节 吴澄的《庄子叙录》 .....	(214)
第七节 苗善时的《南华经公案》 .....	(220)
第十章 宋元佛道二教学者的庄子学 .....	(226)
第一节 宋元佛教学者对《庄子》的援引与阐释 .....	(226)
第二节 宋元道教学者对《庄子》的阐释与研究 .....	(241)
第十一章 宋元理学家的庄子学 .....	(253)
第一节 宋元理学家对庄子思想的吸纳与批评 .....	(253)
第二节 朱熹对庄子及历代庄子学的论说 .....	(273)
第十二章 宋元诗文词曲作家的庄子学 .....	(300)
第一节 宋代散文诗词作家对《庄子》的援引与论说 .....	(300)
第二节 元代散曲杂剧作家对《庄子》的多所阐释 .....	(319)

## 第五编 明代庄子学

第一章 明代庄子学概说 .....	(331)
第一节 明代庄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	(331)

第二节	明代庄子学的发展过程	(336)
第二章	明初的庄子学	(345)
第一节	宋濂的《庄子辨》	(345)
第二节	薛瑄对庄子的论说	(351)
第三节	《永乐大典》所反映的庄子学	(355)
第三章	明代心学家的庄子学	(360)
第一节	明代心学与庄子思想之关系	(360)
第二节	朱得之的《庄子通义》	(369)
第三节	杨起元的《南华经品节》	(382)
第四章	前后七子派的庄子学	(389)
第一节	前后七子派文艺观与庄子思想之关系	(389)
第二节	王世贞的《读庄子》、《南华经评点》	(398)
第三节	胡应麟对庄子的论说	(409)
第五章	唐宋派的庄子学	(414)
第一节	唐宋派文艺观与庄子思想之关系	(414)
第二节	唐顺之的《南华经释略》	(422)
第三节	归有光、文震孟的《南华真经评注》	(426)
第六章	杨慎的庄子学	(455)
第一节	杨慎三种庄子学著作概说	(455)
第二节	杨慎在旧音义外每作新说	(462)
第七章	释性通的《南华发覆》	(469)
第一节	以“道德”二字为内、外篇之指归	(469)

第二节	对杂篇的独特理解·····	(476)
第三节	以庄解庄与对节目文脉的潜心体悟·····	(479)
第八章	陆西星的《南华真经副墨》·····	(483)
第一节	取名《副墨》的用意·····	(483)
第二节	以《庄子》为《老子》之注疏·····	(487)
第三节	以丹书佛经印证《庄子》·····	(493)
第四节	对《庄子》文脉的潜心探究·····	(500)
第九章	沈一贯的《庄子通》·····	(505)
第一节	对旧注旧说的贬驳与称引·····	(505)
第二节	对庄子与儒佛思想异同的多所辨说·····	(510)
第三节	对内、外、杂篇的独特理解·····	(519)
第十章	释德清的庄子学·····	(525)
第一节	《观老庄影响论》倡“三教一致”说·····	(525)
第二节	《庄子内篇注》以佛理解释庄子·····	(529)
第十一章	焦竑的《庄子翼》·····	(540)
第一节	采摭前人治庄著作四十余种·····	(540)
第二节	每以儒学佛理会通庄子思想·····	(543)
第三节	对历代治庄者多有评说·····	(548)
第十二章	李贽的庄子学·····	(555)
第一节	李贽“童心”说与庄子思想之关系·····	(555)
第二节	李贽的《庄子解》·····	(564)

第十三章 公安派的庄子学	(568)
第一节 公安派“性灵”说与庄子思想之关系	(568)
第二节 袁宏道的《广庄》	(575)
第三节 袁中道的《导庄》	(588)
第四节 陶望龄的《解庄》	(594)
第十四章 竟陵派的庄子学	(599)
第一节 竟陵派“真诗”说与庄子思想之关系	(599)
第二节 谭元春的《庄子南华真经(评点)》	(606)
第十五章 方以智的《药地炮庄》	(617)
第一节 合古今之说以炮制庄子	(617)
第二节 称“庄子为孔门别传之孤”	(624)
第三节 谓“庄是易之变”	(629)
第十六章 王夫之的《庄子解》	(636)
第一节 “未始出吾宗”	(638)
——对庄子思想脉络的梳理	
第二节 “探化理于玄微”	(647)
——对庄子思想观点的呈露	
第三节 “循斯须之当”	(663)
——对庄子思想的发挥	
第十七章 明代其他学者的庄子研究	(671)
第一节 陈深的《庄子品节》	(671)
第二节 李光缙的《南华肤解》	(673)



第三节	李腾芳的《说庄》	(680)
第四节	陈治安的《南华真经本义》	(684)
第五节	周拱辰的《南华真经影史》	(692)
第六节	程以宁的《南华真经注疏》	(698)
第十八章	明代戏曲、小说领域的庄子学	(703)
第一节	明代戏曲、小说领域庄子学概说	(703)
第二节	王应遴的《逍遥游》	(710)
第三节	谢国的《蝴蝶梦》	(713)
第十九章	明代佛道二教学者的庄子学	(723)
第一节	明代佛道学者庄子学概述	(723)
第二节	觉浪道盛的《庄子提正》	(736)
第三节	徂亭净挺的《漆园指通》	(746)
第二十章	明遗民的庄子学	(752)
第一节	明遗民对庄子多有新说	(752)
第二节	钱澄之的《庄子诂》	(762)
第三节	傅山的《庄子批点》及其他	(767)

第四编

宋元庄子学



# 第一章 宋元庄子学概说

## 第一节 宋元庄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赵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晚唐五代以来的纷乱历史,使整个社会很快出现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相对繁荣的崭新局面。为了适应这种局面,宋初统治者推行以儒学立国的基本政策,把儒学的振兴与否看成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政治成败的大事。其实,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基本上沿习了唐代儒、道、佛三教并行的政策,在崇儒的同时并不排斥道教(家)和佛教学说,从而使宋代的整个思想文化在继唐代以后仍呈现为儒、道、佛三教长期共存的格局。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伊始,便下诏“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廊之板壁”(《宋会要辑稿·崇儒一》),又亲为孔子、颜回写赞辞,“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馀赞,车驾一再临幸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对儒学颇予褒崇。但他又懂得道教(家)、佛教等思想颇有助于政治和世教,因而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也允许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开宝二年五月,他还向年逾八十的著名道士苏登询问养生之术,苏登回答说:“臣养生,不过精思炼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宋太祖听了这番话后,感到非常高兴,苏登也因此

受到了重赏。宰相赵普也深深意识到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对当时政治的重要意义,因此便“于厅事坐屏后置二大瓮,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瓮中,满即焚于道衢。”(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六)宋初最高统治者的这种政治态度和文化理念,使道家思想在继唐代之后仍然获得了流布的机缘。

太宗对道家思想更为欣赏,认为“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四)并表示:“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同上)他常读《老子》,曾对近臣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所益,治身治国之道,并在其内。至云:‘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此言善恶无不包容,治身治国者,其术若是。若每事不能容纳,则何以治天下哉!”(《宋朝事实类苑》卷二)雍熙中,他还令殿中丞崔颐正“说《庄子》一篇,赐钱五万。”(《宋史·崔颐正传》)淳化三年,他复以《庄子》中“卮言日出”一语为赋题试进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三)。真宗的崇道思想比太宗更为明显,他曾下诏说:“老氏立言,实宗于众妙,能仁垂教。盖诱夫群迷,用广化枢,式资善利。”(《宋朝事实》卷七)并表示,要遵照《老子》五千言来治理天下百姓。这就把对老子的尊崇推向了更高阶段。据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五载,他还于景德二年二月诏孙奭、杜镐等校定摹刻《庄子释文》<sup>①</sup>,于大中祥符元年六月甲辰赐辅臣《南华经》版本人一部,于四年十一月丙子命李宗谔、杨总等校《庄子》序摹板<sup>②</sup>。当时位至宰相的王旦,也刻意追慕道家:“与人寡言笑,默坐终日。及奏事,群臣异同,旦徐一言以

① 《宋史·孙奭传》则谓:“尝奉诏与邢昺、杜镐校定《诸经正义》、《庄子》、《尔雅》谬误。”

②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真庙宴近臣,语及《庄子》,忽命《秋水》。至则翠鬟绿衣一小女童,诵《秋水》一篇,闻者竦立。”宋人亦称真宗为“真庙”,可见他在宴近臣时也尝命诵《庄子》。而小女童在这样的场合能随口诵《秋水》一篇,更说明《庄子》甚至已为当时官中的一般人所喜爱。

定。归家,或不去冠带,入静室独坐,家人莫敢见之。”(《宋史·王旦传》)在学术方面,他还撰有专著《庄子发题》,颇为人们所重视。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太宗、真宗时期的庄子学就得到了较快发展。

由于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在政治方面较多地引进了道家清静无为思想,这就养成了当时士大夫皆趋因循墨守而不喜更张的风尚,使整个国家社会渐渐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困境。因此到了仁宗时期,一股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学术领域方面的变革思潮就不可遏止地出现了。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序录》中说:“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土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适)、杜(醇)五子,永嘉之儒志(王开祖)、经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陈襄)一辈人也。关中之申(颜)、侯(可)二子,实开横渠(张载)之先。蜀有宇文止止(之邵),实开范正献公(纯仁)之先。”(《宋元学案》卷首)这里的“学统”,指儒学的派别而言。大约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儒学便蜂拥而起,表明北宋儒学已开始全面复兴。士大夫们普遍要求回归孔孟之道,到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寻找振衰救弊的思想方法。但是,“旧来儒者不越注疏”(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宋儒所看到的只是一种被汉唐章句训诂之学肢解了的儒术而已。于是,他们各立“学统”,以异前儒之说,而“至永叔(欧阳修)、原父(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同上),从而开创了重在揭明儒典义理而以经世致用为本的新风气。这一风气经由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王安石、苏轼等思想大家的大力推进,愈趋兴盛,终于成了有别于传统儒学的新儒学(理学)。然而,由于先秦儒学本身就缺乏深刻的哲学意味,而宋代新儒学又是以好议论、重思辩为其重要特征,因此理学家们在建构其哲学体系时,除了直接继承孔孟儒学外,还需要吸纳道家、佛教的许多思想理论和思维方法,这实际上使儒、道、佛三教在更高的理论层次和思维方法上得到

了融合。其影响所及,便使宋代庄子学朝着“儒学化”方向发展,并呈现出了重在阐发《庄子》义理的特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思想大家中,对当时及后世庄子学影响最大的是王安石和苏轼。我们知道,王安石所倡导的新学是作为官方思想盛行于世的,而他对《庄子》的研究,又明显表现出了“儒学化”倾向。苏轼所倡导的蜀学属于私学,他阐释庄子的目的同样也是为了把儒、道两家思想统一起来。由于王安石、苏轼对庄子学的大力提倡,以及在他们的庄子学思想中都充溢着儒、道合一的精神,这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北宋中期庄子学的蓬勃发展,而且还大大促进了庄子学与儒学的相结合。

《道藏》陈景元《南华真经馀事杂录》卷上《览过南华真经名氏》列有“景德四年国子监本”。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首《陈碧虚(景元)解义卷末载览过庄子注》作“景德三年国子监刊行本”。景德为真宗年号,说明真宗即位后第七个年头国子监曾刊印过《庄子》。宋代以国子监总辖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可见其所刊印的《庄子》,当是用来作为教材的。苟如是,则其以《庄子》中有关内容入于试题,也是有可能的。此后,王安石曾著《庄子解》四卷。这一著作是否与他的《三经新义》一样也被一度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现已不得而知。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载录,王安石的得力助手吕惠卿著有《庄子义》十卷,“(神宗)元丰七年,先表进内篇”,亦不知朝廷以此书作何用。又据《道藏》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首《今所纂诸家注义姓名》所载,陈景元曾于神宗熙宁间主中太一宫,“召对进《道德》、《南华》二经解,颁行人藏。”《道藏》薛致玄《述道德真经藏室纂微开题科文疏》还说他尝奏请朝廷,凡遴选道官,“乞试《道德》、《南华》、《灵宝度人》三经十道义”,神宗“喜其请,降编修所,而后道家之学翕然一变,自兹始也。”总之,自真宗以来,尤其到了神宗时期,虽然儒学业已全面复兴,但道家学说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反而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景象,甚至还成了政府所举行的某些考试的重要内容。所以,在哲宗登位后的

“元祐更化”期间，君臣便坚决不许主司从《老子》、《庄子》等道家书中出试题。如宰相吕公著曾于元祐元年“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安石）。”（《宋史·吕公著传》）哲宗更于元祐二年正月下诏说：“举人程试，主司毋得于《老》、《庄》、《列子》书命题。”（《宋史·哲宗纪一》）但是，神宗时庄子学既已形成蓬勃发展的态势，因而此时在文化、学术等领域内也就不可能马上遏制这种发展态势了。事实表明，这一时期的庄子学仍是比较兴盛的。如陈详道、林自等，其从事庄子研究当主要就是在哲宗时期。

徽宗登位后，即一改其兄哲宗的做法，对道教（家）表现出了十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政和以后，其崇道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南宋道士赵实庵说：“逮宋徽宗渊衷湛净，睿智光辉，受帝心秘密之言，续道祖将残之命，范传金箓，宫敞神霄，制飞天法轮道藏之文，训混元皇帝道德之旨。广开元学，诏簪褐以三舍之科；宠示道宫，赐掌教以近臣之秩。至于天文宝篆，诗颂符图，皆万世之所未闻。”<sup>①</sup>这比起真宗来，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配合着这样的所作所为，徽宗又于重和元年九月“诏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宋史·徽宗纪三》），这是在继唐玄宗置玄学博士之后出现的又一次为道家经典置博士的举措，也是整个宋代所出现的唯一一场为道家经典置博士的闹剧。及至钦宗即位，“复以诗赋取士，禁用《庄》、《老》”（《宋史·钦宗纪》），这场闹剧也就随着《庄子》、《老子》的禁用而成了历史。但不管是徽宗为道家经典置博士，还是钦宗禁止主司从《庄子》、《老子》中出试题，都对当时庄子学的影响不大。因为这时的庄子学，主要仍是体现于学者独立的学术研究和文士的个人创作之中，前者

<sup>①</sup> 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大旨》卷中引，见《道藏》。



如吴侑著《庄子注》<sup>①</sup>，后者如叶梦得<sup>②</sup>、程俱在诗文中对《庄子》的多所阐释等等，便都说明了这一点。

南宋时期，君主在制定国策、下诏令时不怎么涉及到《庄子》，但不少臣子却曾研治过《庄子》，并撰有庄子学专著。如洪兴祖（高宗时官至太常博士）曾著《庄子本旨》，赵汝谈（理宗时官直学士、进权刑部尚书）曾著《庄子注》，马廷鸾（度宗时进右相兼枢密使）曾著《读庄子笔记》等等，这些对当时的庄子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众所周知，南宋一朝，偏安于东南一隅，北方的大片土地沦陷于金贵族的统治之下，许多爱国志士为收复失地而长期奔走呼号，却屡遭投降派的打击和迫害，使他们的美好理想完全成了泡影。因此像李光、辛弃疾等人便渐渐爱上了主张逍遥无为的庄周，并以诗文阐释了庄子思想。及至南宋的覆灭，则连苟延残喘的偏安局面也不可得了，这使一般的士人都真正尝到了亡国的耻辱，完全感到了无可奈何，所以即使像郑思肖、方凤这样崇奉儒学的士子也与庄子亲近了起来，参与了对《庄子》的阐释活动，从

① 据《宋元学案》卷九十六、《元祐党人传》卷六等记载，吴侑是苏辙的学生，哲宗元祐中为庐州教授，绍圣元年试中制科五等，累官承议郎。徽宗崇宁元年入党籍。高宗绍兴五年赠直秘阁。而《道藏》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首《今所纂诸家注义姓名》“吴侑注”下之注则云：“崇、观间人。”说明吴侑虽然经历了哲宗、徽宗、高宗三朝，但他的《庄子注》则著于徽宗崇宁、大观之间，故褚氏在介绍作为庄子学者的吴侑时，便直谓其为“崇、观间人。”

②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八著录，叶梦得原有总集一百卷，已佚。从今所传《建康集》八卷中常用《庄子》典故来看，则其原来的总集中当有很多地方涉及到了《庄子》。而且他在《避暑录话》卷上中说：“《庄》、《列》之言，皆与释氏暗合，第学者读之不精，不能以意通为一。……吾为举子时，不免随众读此二书，心独有见于此。为丹徒尉，甘露仲宣师授法于圆照本久，从佛印了元游，得其聪明妙解。吾常为言之，每抚掌大笑，默以吾说为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时与论方外之事，未之得也。”这又说明，叶氏自哲宗绍圣间为举子时直至南宋初年退居林下，其间始终思考着《庄子》的有关问题，因而在《避暑录话》、《岩下放言》等书中就能对《庄子》及前人的庄子学提出自己的许多独特看法。